

太虛大師與人間佛教

潘文彥

——為太虛大師研究會會刊而作（二）

三、世界現代佛教

鴉片戰爭打開國門後，五口通商，西方民主、科學的思想像潮水般湧來，不少有識之士，出洋考察，仁人志士，尋求救國救民的途徑，那時的佛教界也湧現出不少有識之士。特別是辛亥革命成功，長達二千多年的帝王專制制度被徹底推翻，建立了共和政體，這是時代的轉型，是徹底的革命性的轉型。中國傳統佛教完全不能適應於嶄新的、沒有帝王的共和體制，而佛教自身的種種弊端，又逐一暴露在世人的面前。歐陽漸曾因此發出激烈的呼籲：「中國內地僧尼，約略總在百萬之數，其能知大法、辦悲智、堪住持、稱比丘不愧者，誠寡若晨星。其大多數，皆遊手好閒，晨夕坐食，誠國家一大蠹蟲！但有無窮之害，而無一毫之利。」章太炎和蘇曼殊發表的《敬告十方佛弟子啓》中說：「法門敗壞，不在人緣而在內因，……叢林規範雖存，已多弛廢，不事奢摩靜慮，而惟終日安居。不聞說法講經，而務為人禮懺，則專計貲財，……無益於正教，而適為人鄙夷。」寺僧

素質良莠不齊，多不以佛法為務，專以禮懺為本，馳情於名聞利養之中，佛教義學逐漸式微，此類現象，在佛教進入衰落期之後，越來越嚴重，直至清末民初，佛教衰頹之勢，達空前之地步。僧人之「不規行為，引起地方人士不滿與憤恨，導致許多地方，侵佔寺產，搗毀佛像，驅逐僧尼等事件，屢有發生。」一個文化素質極其低劣的佛教僧團，必然會影響佛教事業的健康發展，佛教所受到的外部巨大的壓力，論其根源，主要是來自於僧團內部的不振。正如《仁王經》說：「獅子身中蟲，自食獅子肉，非外道也。」佛教應該在社會轉型中調適自身，以適應社會，這是最大的、也是最重要的極其迫切的課題。於是，有識之士，就有急切地辦學育僧之挽救措施，以革新教團。

鑒於上述佛教界內部的種種不良情況，社會上方方面面人士，對佛教存在的問題提出嚴厲批評。太虛大師亦曾感慨地說：「迨乎前清，其衰也始真衰矣，迨乎近今，其衰也，始衰而瀕於亡矣。」民國初年，社會上一

些勢力，乘機提出將寺產沒收，充作辦學之用，當時的中國佛教總會會長寄禪法師，就是抱著捍衛寺產，力爭宗教信仰自由之決心，進京向政府提抗議，然而結果反遭屈辱，在北京含冤西歸。但不管怎麼說，中國佛教自身確實需要作出急切的重大的根本性的改變，以改造成一個能夠適應新時代的佛教，久久沉睡的中國傳統佛教，應該猛醒過來，開創自己的新時代。歷史證明，在一時代的領軍人物應當首推太虛大師。筆者認為，太虛及時地提出「人生佛教」，又很快過渡到意義更為完善的「人間佛教」，從此，為影響世界的漢語系佛教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期——太虛時期。下面略作分述：

（一）前太虛時期

清末民初，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和自然科學一起介紹到中國。人們注意到西方的社會改革是從宗教改革開始的，有識之士注意到，在中國，真正的宗教，只有佛教。¹

當時知識界對佛教的研究不再受一宗一派的門戶之見，開始用西方社會科學的思想和理論工具，結合中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藝術等上層建築各個領域，進行全方位的、廣泛的研究。這一時期的佛教研究，已經不再

局限於僧侶和居士，很多學者也競相研習佛學，一批佛教雜誌相繼問世，沉寂已久的佛教義學的研究取得一定的進展，培養和造就了一批現代佛教學者。在有識之士楊仁山等人的努力下，流落在日本的許多經典，被陸續請回中國，三論、唯識、律、密等宗，在中國已經有了復興的跡象，但因為中國佛教近千年來，不重視僧教育，沒有及時培植僧才，使中國佛教在民初只是曇花一現的中興。其中當首推者，應以被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稱譽為「中國佛教復興之父」的楊仁山。

楊仁山原名文會，安徽池州石埭人。青年時，讀《大乘起信論》而信佛，是中國佛教復興的關鍵人物。光緒四年（西元一八七八年）和光緒十二年（西元一八八六年），先後兩次以外交使團參贊名義，出使歐洲，在英國逗留七年之久，對英國的政治制度、工業發展、社會和宗教等狀況，作了全面考察和研究，他注意到了英國社會的變革和進步，都是從宗教改革開始的。光緒十六年（西元一八九〇年）回國，他以新的、客觀的角度看中國，曾經向光緒寫了條陳，但慈禧沒有理睬。他在英倫的另一項重要的收穫是結識了日本僧人楠條文雄博士，從楠條處獲悉中國唐代很多散失之佛經，多為日本寺院所保存。於是楊便託楠條代為搜購。仁山與

楠條交往三十年，楠條從日本搜購散逸之佛教經典近三百種，其中包括唯識宗經疏，如玄奘法師的四大神足之一窺基法師撰寫的《成唯識論述記》六十卷，陸續寄給楊氏。楊仁山自同治五年（西元一八六六年）創建金陵刻經處，掀起了繼北宋以來的第二次刻印佛經之高潮，到楊仁山逝世，前後四十年間，金陵刻經處共印刻經書兩千卷，流通百萬餘卷，佛像十萬餘幀。楊仁山由於受到日本和歐美研究佛教的啟發，積極推行新式佛教教育，晚年辭去一切工作，專心弘揚佛法，在金陵刻經處內創設「祇洹精舍」，講授佛學。人才濟濟，門人之中，譚嗣同善華嚴，桂柏華善密宗，黎端甫善三論，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、梅摛芸（梅光羲）、歐陽漸、太虛等人，他們在佛學研究上，都是卓然成家的大學者。可以說，門牆桃李，英才輩出。繼承楊氏事業者，其弟子歐陽漸，於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，古印度稱中國為支那，佛教自稱其學為內學，故名。其宗旨為「闡揚佛學，育材利世」，一邊教育，一邊刻經，又培養了不少佛門英才。並首倡在家居士可住持佛法之義，奠定了居士林道場之基礎。（抗戰時，歐陽漸之繼承者呂澄攬經版避寇前往四川江津，繼續辦學，至一九五二年，被迫停辦。）可以肯定，以楊仁山為代表

的一批具有民族氣節和世界眼光的居士，振臂高呼，抱著偉大的愛國情懷，希冀以「佛教救國」的美好心願，積極主張改革傳統佛教的舊制，振興佛教事業。特別是楊仁山、歐陽漸等人，放眼世界，他們的思想已經明確地轉變為「佛教救國主義」。在楊仁山、歐陽漸的帶領下，民初中國佛教短暫的中興時期，為佛教界作出很大貢獻的居士大德，還有譚嗣同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太炎、章士釗、梅光羲、王恩洋、蔣維喬、黃侃等人，他們極力主張弘揚佛儒之學，梁啟超認為「佛教是建立在極嚴密的忠實的認識論之上」，「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達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」。梁又在《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》一文中說：「佛教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，乃兼善而非獨善，乃入世而非厭世，乃無量而非有限，乃平等而非差別，乃自力而非他力。」以此六大特徵，表明佛教的積極性，可以救國救民救心。並明確表示：「捨己救人之大業，唯佛教足以當之。」

民初佛教的中興，中國佛教界也湧現出一批龍象，下面略作介紹：蘇州印光大師，在靈巖山建立淨土道場，悲智雙修，被推為淨土宗十三代祖師；弘一大師，在福建弘揚南山戒律，創建「南山律學院」，著述《南山律比丘戒相表記》，為當代中國佛教界在持戒方面立下

了重要標竿，被佛教界尊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；太虛大師號召佛教革命，宣導人間佛教理念，創建武昌佛學院，而後又主持閩南佛學院，精心培養僧才；虛雲老和尚，一身而繫五宗（曹溪、臨濟、雲門、法眼、滙仰）法脈，為近代禪宗的泰斗，一九五三年被推為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。以上即為當代中國佛教界的四大高僧。

其他尚有：華嚴宗有清末巨匠月霞，天臺宗有支柱諦閑。禪宗另一位高僧敬安，字寄禪，燃兩指供佛，世稱八指頭陀，民初時被公推為中國佛教總會會長。圓瑛，一吼堂主，歷任多所大叢林住持，一九二九年任中國佛教會會長，抗日戰爭時期，曾赴南洋弘法，新中國成立後，圓瑛是第一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。再如東北的倓虛、上海的應慈等等，都為佛教的復興作出了巨大的貢獻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1. 雖說有儒釋道三家，儒家主張三綱五常，君臣父子，他的理論長時期來，和帝王專制統治纏繞在一起，它是入世的，目標是修成聖人。因為儒家沒有宗教團體組織和嚴格禮儀軌範，很長時間以來，儒家是不是宗教，一直未有定論；道家出世，孤雲野鶴，離群索居

，不食人間煙火，煉仙丹，求長生不老，目標是成仙，對社會影響力小；釋家是以出世之心，做入世之事，有系統而嚴密的哲學思想和理論體系，有僧團的組織形式和禮儀制度，它的目標是成佛和建設人間淨土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雖然佛教是外來的，但是作為宗教，佛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，普遍而又深遠，所謂「家家阿彌陀，戶戶觀世音」，實際上，到了清末，中國各地，道觀和文廟的數量，比之於佛教叢林和寺院來，根本就不在一個數量級上。一般說，一個縣只有一座文廟，供奉孔聖人，或有隨侍賢人數名；道觀則更少，往往幾個縣才有一座，或者供奉三清真人，或者供奉玉皇大帝，卻沒有見過供奉老子李聃的；而一個縣的佛寺禪院庵堂，常常不下數十座，譬如上海市中心八大區，一名靜安，一名普陀，還不計入真如，七寶名鎮。至於每個縣必有的縣城隍和土地廟，還有關帝廟，東嶽廟和各種神廟，既不屬於道教，也與儒家毫無瓜葛。所以，晚清國門被打開之後，愛國的有識之士，瞭解到西方的社會改革和進步是由宗教改革起始的，觀照中國的實際情況，就把著眼點自然地落在佛教上。特別是唯識之學的主要經典《成唯識論述記》由日本傳回，引起當時知識界的普遍關注，其流行之風，正好比剛解放時，言必稱馬列一樣。